

# 档案学创建时期的学术群体研究

周燕青, 李艳楠

(红河学院图书馆, 云南 蒙自 661100)

**摘要:**档案学创建时期的研究成果是一笔珍贵的档案学遗产。主要论述创建时期中机关文书档案学术群体、历史档案学术群体及“文华集团”学术群体的构成、主要成就及研究特点。通过对该时期学术群体的构成、研究成就及特点进行梳理和评价,可以总结学术群体的发展条件和趋势,增强学科认同感,为推进档案学派的构建提供借鉴。

**关键词:**档案学术群体;研究成就;特点

**中图分类号:**G27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98(2015)01-0042-04

##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Groups in the Period of Archival Science Creation

ZHOU Yan-qing, LI Yan-nan

(Library of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Yunnan, 6611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period of archival science creation are a precious legacy of archival science. The paper primarily discusses the constitution, main achievements and the research features of the academic groups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achieves, the academic groups of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Wenhua Group". The collation and comments on the constitution,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helps to summarize the conditions and tre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groups and to strengthen subject identity,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s of archival science.

**Key words:** Academic Groups of 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Achievement; Feature

民国时期,在行政效率运动、明清历史档案整理热潮及近代档案专业教育三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产生了近代中国档案学,由此可将民国视为档案学的创建时期。处于创建时期的档案学,并未形成自身的社会、文化系统,致使不同档案学者所形成的集合仅能用学术群体称之。学术群体即知识构成与教育背景相似,研究对象相通,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态度、基本观念和基本意向一致,科学成就、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教科书等研究成果集中于同一领域的档案学者构成的集合。因而可将该时期的学术群体划分为机关文书档案学术群体、历史档案学术群体与“文华集团”。对我国档案学创建时期的学术群体进行研究,不仅能直观地反映

出该时期内档案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揭示这一时期档案学的研究成就和学术特点。同时能让档案界人士更清晰地了解该时期的理论研究脉络,对档案学科的认识更加清晰,增强学科认同感。为此本文对该时期的档案学术群体做一简单论述。

### 一、学术群体的构成

#### (一)机关文书档案学术群体的构成

民国时期,以机关文书档案为主体的档案工作快速发展,为机关文书档案学术群体的出现奠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政府机关发起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的“行政效率运动”。改革过程中,许

收稿日期:2014-07-13

作者简介:1.周燕青(1987-),女,云南开远人,档案学硕士,红河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档案管理。

2.李艳楠(1982-),女,云南蒙自人,红河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学。

多档案工作者以及行政界的官员发表文章,以探讨管理体制、档案分类等。这些档案学者的研究对象以现行机关文书与档案管理工作为主,所得研究成果与档案实践工作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档案主要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而存在,注重文书工作的现实效用,通过总结机关文书档案改革的实践经验,形成自己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因此可将其视作机关文书档案学术群体。该学术群体的主要成员是国民政府行政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甘乃光、周连宽、腾固、程长源、何鲁成等。

### (二)历史档案学术群体的构成

民国时期的“八千麻袋事件”后,明清历史档案整理的序幕得以正式拉开。1931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禹贡学会等各类机构对明清档案进行了颇具规模的收集、整理、编纂、保管等工作,各界共同掀起明清历史档案整理的高潮。史学界学者在从事明清历史档案整理工作的同时,热衷于档案学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大批历史学家在此次明清历史档案整理过程中获得档案学领域学术成果。因这些研究学者多拥有历史专业背景,研究对象皆为历史档案,强调档案主要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而存在。他们坚持从史学角度出发来研究明清历史档案,广泛借鉴与吸收人文科学的成果,通过总结历史档案实践工作经验,形成历史档案学理论体系,因此可将其视作历史档案学术群体。该学术群体主要成员包括沈兼士、方甦生、陈垣、顾颉刚、吴晗、单士魁等学者。

### (三)“文华集团”学术群体的构成

民国时期,专职档案机构普遍设立,档案人员原有的师徒相传的封建世袭传统教育形式无法满足档案人员的培养需求。为改变让人诟病的档案教育方式,培养大量具有史学基础、编辑水平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档案工作者,国民党政府在开展“行政效率运动”的过程中,创立了近代中国档案专业教育。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内,附设了一个学制为两年的档案管理专科<sup>[1]</sup>。该校的老师和毕业生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研究力量,被称为“文华集团”。另有殷仲麒开办的私立崇实档案学校,私立中国档案函授学校。由于这些学者以从事档案教育为

主,既是档案专业教师,又是档案学者,积极探讨与研究档案学理论,编写档案学教材,提出许多创新见解。因此可将其视作“文华集团”学术群体,该学术群体主要成员有毛坤、殷仲麒,二人大力地推进档案专业教育的发展。

## 二、学术群体的主要成就

### (一)机关文书档案学术群体的成就

第一,界定档案概念,并正式提出“档案学”一词。何鲁成在其所著《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中指出:“档案者乃已办理完毕归档后汇案编制留待参考之文书。”<sup>[2]</sup>该定义中将办理完毕后归档并立卷保存,以作参考之用的文书视为档案。在我们如今看来,这种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将档案的范围局限于文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定义点明档案的特质,指出文件成为档案的条件,有利于明确档案与文书的界线,为后期的档案学者对档案进行科学定义奠定理论基础。

1935年,“档案学”一词正式问世。腾固在《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指出:“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学(Archives Ween)的学问,在欧洲也是近百年来发达的事。”<sup>[3]</sup>另有龙兆佛提出档案学的学科地位提高的愿望,其在《档案管理法》一书中指出,档案学的学理虽然尚是空泛,但是以后必将发展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档案学也可拥有与图书馆学相等的地位,其正式提出表明人们开始对档案与档案工作进行理论研究,逐渐将档案学视作专门的研究对象,同时标志着档案学研究开始步入较为细致、深层次的状态,把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标志着中国档案学的产生。从此,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开始有了档案学这门学科。

第二,推行文书档案连锁法。文书档案连锁法是民国时期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中心内容,为甘乃光所倡导。1994年版的《档案学词典》认为文书档案连锁法具体做法是将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在分类、编号、登记、归档四个程序上进行集中统一<sup>[4]</sup>。民国时期,文书与档案之所以能连锁,是因为档案与文书实乃一物。何鲁成提出文书与档

案是同一物的不同过程,充分揭示文书档案的发展规律。文书档案连锁法为今天的“文书档案管理一体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依据,它实际上也可视为文档一体化的雏形,其相承之脉清晰可见。

## (二)历史档案学术群体的成就

第一,系统地分析明清档案的内容和价值,让档案价值理念得以传播。在明清历史档案的抢救及整理过程当中,众多学者由此开始了解档案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早在1922年之时,蔡元培在其发给教育部的公文当中,就提到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都是清代历史珍稀可贵之材料。除此之外,他也将档案视作直接史料。沈兼士也说过“档案是未掺过水的史料”。及至文献馆时期,档案是珍贵史料的观念仍得以坚持。另有徐中舒、蒋廷黻等学者亦认为“档案具有史料价值”。他们在具体分析明清档案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如,历史档案要集中统一管理并向学术界刊布,档案史料鉴定及编纂的必要性,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史料价值的发现意味着这一时期档案从一元的工具价值观扩展到工具与信息并重的二元价值观<sup>[5]</sup>。

第二,提出具有先进性的明清档案整理原则。故宫博物院时期,明清历史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整理过程中,坚持按系统保管,尊重档案形成规律,并按其形成机构聚集。按档案的形成者聚集,即尊重全宗原则。遵照其来源,保证同一来源的档案不分散,不同来源的档案不可混淆<sup>[6]</sup>。该原则保证明清档案得以规范和条理。除此之外,文献馆在整理档案过程中提出尊重原有整理基础的原则。明清时期所留档案本身已有一定的整理顺序,遵照其原有整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可减轻工作量。史语所在整理档案之时,坚持整理与刊布并重。刊布档案可为学术研究提供原料,以另一种方式促进档案的保存。同时,档案学者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以记载其在实践过程中所得的档案学术思想。

## (三)“文华集团”学术群体的成就

近代档案教育的出现。193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简称文化图专)开设档案管理课程,其中的档案经营法由毛坤负责讲授,他是第一个在我国讲授档案管理课程的学者。至1939年,

国民政府为改变传统的经验式的教育方式,培养适应近代国家机关所需档案人才,教育部于文化图专内附设档案管理专科。讲授内容主要是档案管理,同时教授图书管理知识,前后共毕业五十余人。文华图专是近代社会中以培养图书与档案管理专业人才为主的专科学校,并成为我国最早设置档案管理专业的学校,它是我国早期档案教育的摇篮。而后,我国的档案学教育逐步呈现专业化、正规化的趋势。此外,毛坤先生将欧美档案学教育的有益经验与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将档案教育目标细致为三部分:一是培养研究整理档案的人才,二是培养行政管理档案的人才,三是培养文书制作的人才<sup>[7]</sup>。

档案专业教育是档案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它是近代中国档案学的催生素,促进近代档案学的研究。档案教育在为档案学研究及档案工作培养优秀档案人员的同时,也为档案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师资力量。

## 三、研究特点

### (一)研究内容的完整性

近代档案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涵盖了档案、档案管理、档案行政和档案人才四方面,其研究成果多以专门的论著形式发表。

档案学者对档案的研究包括其定义、性质、种类和作用。如档案定义的表述,机关档案学术群体侧重于从公文的角度来表述档案的定义;而历史档案学术群体着重从档案必须是以历史记录的角度来研究档案定义的表述。至于档案的作用问题,则有殷仲麒所提的“供行政之参考,备学术之研讨,于国史尤为切要”三个作用。档案管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工作环节的划分、分类、编目、价值鉴定四个问题的原则和方法论述。另有学者对档案组织、人事、经费、工具等行政问题进行研究,该研究有益于实现档案工作的最经济效用,这个观点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档案管理要讲求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颇为相似。另外,档案学者就档案人才的条件及其如何选用的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近代档案学的研究内容相较于古代而言,研究范围增广,成果更为系统完整。多数学者将其

研究成果著书立说,以传播其观点,指导以后的档案工作。

### (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

民国时期,多数机关采用档案室集中保管本机关档案的组织形式。但是,机关档案室的“卷阁”把持档案,盘踞操纵地方机关档案管理,严重影响行政效率。随着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开展,为整顿文书运转迟缓和档案管理混乱的现状,行政界学者多以机关档案室的档案管理为研究对象,导致其研究范围局限于机关档案室,档案馆工作则被忽视。而且国民政府始终未建立起近代规模的档案馆,愈发阻碍了学者对其管理工作等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 (三)研究成果的多元性

研究成果的多元性主要是由其研究主体和研究重点不同所决定。档案学创建时期的研究主体分别来自行政界、史学界和教育界三大领域。该时期中,在行政效率运动的推动下,行政界的研究处于主流地位,史学界和档案教育界的研究则处于辅助地位。有别于封建社会时期以史学界为研究主体,档案学思想基本都出自于史官的现象。因各领域的学者知识构成与实践经验不同,他们的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行政界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关注的焦点是文书与档案,将档案视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在档案行政、档案人士以及档案管理技术三方面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史学界则对历史档案管理,即档案馆管理理论提出了包括利用原基础为核心的较为系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他们将档案视作历史的原始记录,广泛吸收与借鉴人文科学的思想成果。档案教育界则较全面地介绍西方档案学和图书馆学及其在我国的应用,同时要从事档案教育工作。在三股力量的推动下,创建时期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档案学的宏观与微观问题都有所探讨,有所研究。

### (四)研究方式的多样性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为推动我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发展,档案学者逐步学习并引进欧美各国档案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当时的档案学专著大都提及并引用国外档案学的来源原则、分类整理等有关理论。作为当时档案学中心内容之一

的档案分类,深受欧美各国图书分类法影响。档案分类所采用的十进分类法,是按照美国杜威图书十进分类法的分类原则改制而成。我国档案学者将图书分类法用于档案管理,其主要原因为近代档案急速增长,档案种类增多,致使档案分类逐渐复杂,传统的分类方法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因此急需较为科学的分类方法。而西方的档案学和图书馆学发展得较为成熟,近代档案学者只能逐步学习和模仿欧美档案分类法,尤其是欧美的图书分类法。因为欧美的档案分类普遍采用来源原则,而档案学研究对象局限于机关档案室,所以以问题为区分原则、以数字或符号为代号的图书分类法更易吸收。

近代的档案学研究大量参考和借鉴了欧美档案学、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档案学者在学习、移植和借鉴欧美各国档案学理论、原则与方法的过程中,会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但对于我国近代档案学的研究现状来说,其移植和借鉴的行为得到了肯定。

总之,近代中国档案学者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原有的档案学观点与新观点结合,把悠久绵长的中国档案管理经验总结、升华为较系统的档案学理论,并最终塑造成一门科学,让中国档案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 参考文献:

- [1]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2]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 [3]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4]张会超.文书档案连锁法的重新审视[J].档案学研究,2011.
- [5]张会超.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 [6]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7]姚乐野,王阿陶.毛坤先生档案学教育思想探微[J].图书·情报·知识,2009.

[责任编辑:吕娟]